

黃周星《唐詩快》與王夫之《唐詩評選》 選評杜詩比較

張容欣*

摘要

黃周星《唐詩快》與王夫之《唐詩評選》，皆為明末清初的唐詩選本，選家也都具有明遺民的身份，學者認為兩部選本的選評情況與眾不同，具有鮮明的選家個人特色。本文以兩書選詩數量高居首位的杜甫為對象，比較《唐詩快》與《唐詩評選》選評杜詩的同異，並探究兩家選評杜詩差異的原因。

研究發現，《唐詩快》和《唐詩評選》皆選的杜詩僅有小部分重疊，兩家對共同選錄的詩題評論相近，多肯定杜詩筆法與詩歌成就。兩書獨選的杜詩較多，乃因黃周星以快為編選理念，評詩多抒發個人心得，重在體會杜詩的情感，評語常讚嘆杜詩的豪邁奇特、真情動人；王夫之論詩以平為貴，強調杜詩平美風格與含蓄情感，同時藉由批評杜甫與詩教相悖之作，貶斥明人誤解杜詩。期能透過對比，呈現出兩家對杜甫的接受，並深入理解明遺民選評唐詩所反映的晚明風氣。

關鍵詞：黃周星、《唐詩快》、王夫之、《唐詩評選》、杜甫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學生。

一、前言

黃周星（1611-1680），字景虞，一字九煙，金陵上元人，明末進士，曾於南明王朝任職。¹明亡後不仕，更名黃人，更字略似，又號半非、圃菴、汰沃主人、笑蒼道人。後浪跡吳越之間，晚年避居湘潭。康熙 19 年（1680）五月五日自撰墓誌〈解脫吟〉十二章，飲酒大醉，自沉而死。²著有《夏為堂詩略刻》、《九煙先生遺集》、《將就園圖記》、劇本《人天樂》、唐詩選本《唐詩快》等。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又號夕堂，湖南衡陽人。明末舉人，曾於衡陽起義抗清，失敗後短暫擔任南明朝廷的行人一職，明亡後隱於湘西石船山，終身不仕，世稱船山先生，為明末清初大儒、思想家、文學家。詩學著作有《詩繹》1 卷、《夕堂永日緒論·內篇》1 卷及《南窗漫錄》1 卷，詩歌選本《古詩評選》6 卷、《唐詩評選》4 卷、《明詩評選》8 卷。

透過梳理黃周星和王夫之的生平，可知兩人在明朝皆有功名，也曾在南明朝廷任職，且在明亡後都選擇避不出仕，隱居於湖南一帶，以遺民身分自處。黃周星和王夫之在生平經歷，以及所處時空背景方面，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唐詩快》與《唐詩評選》也有其共通點，如兩部選本皆成書於明朝覆滅後，³且在清代流傳不廣、知名度低，對當時詩壇的影響較小。⁴此外，學者認為兩部選本的選評與世

¹ 黃周星初生時為周氏撫養，故從周姓，由湖廣湘潭（今湖南湘潭）籍入北雍（即北京國子監）。崇禎17年（1644），南京福王朝廷授戶部主事，同年請復黃姓，加於原名之前。黃周星生平參見〔清〕陳鼎：〈笑倉老子傳〉，《留溪外傳》，收入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128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5隱逸部上，頁277-279。另一說為黃周星本姓周氏，湘潭人，出生於金陵，為上元黃氏撫養，遂冒其姓為黃周星。見〔清〕鄧顯鶴：〈黃崎人周星〉，《沅湘耆舊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27，頁10b。

² 〔清〕朱彝尊著，〔清〕姚祖恩編，黃君坦點校：《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卷21，頁648。一說為自沉後仍被救，直到7月23日絕食而卒。見〔清〕葉夢珠：《閱世編》，收入闕名輯：《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8年），卷4名節一，頁104-108。

³ 黃周星〈選詩略例〉云：「余以旅館刺促，勢難持久，乃自季春迄秋杪，忽忽竣役，誠可謂殫竭心力。」又〈選詩前後諸詠〉云：「余自癸丑歲有選詩之咏，忽忽又數載矣。至己未之春，館於岑山程子齋中，因從事斯役，於是先成《唐詩快》十六卷，復笑咏四首識之……」由此可知，《唐詩快》編選用時不到一年，成書於康熙己未年（1679），是黃周星晚年的著作。見氏著：《唐詩快》（康熙32年（1693）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卷前，頁1a、4a。為簡省篇幅，以下僅隨文標示書名、卷數、頁碼。至於《唐詩評選》的成書時間，蔣寅參考劉春建《王夫之學行繫年》，認為該書成於王夫之40歲重新留意詩學，而評選前代詩歌作品之後。見氏著：〈王夫之的詩歌評選與唐詩觀〉，《文學與文化》2011年第2期（2011年5月），頁4。

⁴ 根據黃瓊的考證，《唐詩快》的相關介紹僅見於清人鄧顯鶴（1777-1851）《沅湘耆舊集》、楊際昌（1779-？）《國朝詩話》、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下）》和孫殿起（1894-1958）《販書偶記》，故論者主張「迄今為此尚無人對《唐詩快》一書作過全面而系統的梳理、挖掘及研究」。見氏著：《〈唐詩快〉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頁4。除此之外，劉聲木（1876-1959）貶斥《唐詩快》曰：「然此等選本，實為詩中魔障，以不傳為愈。其人足重，其書不足重也。」見氏著：〈黃周星唐詩快〉，《萐楚齋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7，頁814-815。雖然黃瓊並未注意到劉聲木的批評，但《唐詩快》作為善本書，其流傳與研究情況確實符合兩人所言。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學說在生

俗審美差距甚大，孫琴安指出，《唐詩快》「雖選錄了一部分名篇，但有許多詩不是名篇，都是作者自選的，表現了作者一定的眼力。……雖有時也稍引他人評語，但基本上都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和體會。」⁵黃周星的選錄與評論，大抵是出自己意，不隨波逐流。至於《唐詩評選》，蔣寅則評價云：「王夫之不僅對湖南的詩歌傳統極為自負，對自己的審美判斷力也極其自負。自信自己的趣味超出時流而必不為其所贊同，所以再三表示對此的不屑。……這種自負復自信的態度，使他勇於發表自己的獨到見解，用於堅持異於俗論的批評立場。」⁶王夫之在詩歌鑑賞方面有其獨特的看法，甚至對當時流行的詩論不以為然，可見《唐詩快》和《唐詩評選》都充滿選家不與俗同的個人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詩快》和《唐詩評選》中，杜甫（712-770）詩的選錄數量都位居第一，約為第二名詩家的兩倍，⁷換言之，即便是在選評異於世俗的選本中，杜甫也是最受重視的詩家。統計兩書所選杜詩數量，如下表所示：

表一 《唐詩快》與《唐詩評選》選錄杜詩情形

	《唐詩快》	《唐詩評選》	兩書重疊 ⁸
選錄杜詩數量	136	91	21
共同選錄杜詩比例	15%	23%	-

《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共同選錄的杜詩有 21 首，兩書所選錄的杜詩，僅有兩成左右重疊，可見兩家對杜詩的選評應有許多不同，故黃周星和王夫之選評杜詩的同異及原因，乃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然而，由於《唐詩快》為善本古籍，

《唐詩快》和《唐詩評選》對杜甫選評的比較研究暫付闕如。

學界目前對黃周星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生平交遊、戲曲劇作、詩歌創作及其遺民身分。有關《唐詩快》的研究，如孫琴安和賀嚴都簡要介紹《唐詩快》的成書、選詩標準和選本特色。⁹黃瓊《《唐詩快》研究》則分類選本所收的詩作題材，以

前與下世後200年間均未彰顯，直到族裔王世全（？-？）、鄧顯鶴（1777-1851）以及曾國荃（1824-1890）等人先後刊刻《船山遺書》，其學術面貌方展現於世。劉人熙〈唐詩評選序〉提到：「船山評選唐詩，從其家得祕本，兒子端沖校閱一過，獨恨其未精核也，未付梓人。余恐其久而逸也，故速傳之同學。」由「祕本」、「未付梓人」、「恐其久而逸」的敘述可知，《唐詩評選》直到民國初年都還是較為罕見的唐詩選本。見氏著：〈唐詩評選序〉，收入〔明〕王夫之著，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4冊《唐詩評選》（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卷末，頁1142。為簡省篇幅，以下僅隨文標示書名、卷數與頁碼。

⁵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207。

⁶ 蔣寅：〈王夫之的詩歌評選與唐詩觀〉，頁7。

⁷ 《唐詩快》選錄數量第二名為白居易57首，與杜甫136首相差約2.4倍（ $136/57 \approx 2.4$ ）；《唐詩評選》選錄數量第二名是李白43首，與杜甫91首相差約2.1倍（ $91/43 \approx 2.1$ ）。

⁸ 參見附錄一：《唐詩快》與《唐詩評選》皆選錄的杜甫詩作。

⁹ 分見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205-207；賀嚴：《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01-104。

此探究黃周星的生平經歷對選詩之影響。¹⁰相關的前人研究，對於《唐詩快》選錄杜詩的情形皆無更深入的分析。

關於王夫之詩學的現有研究面向，包含以意為主、以平為貴、情景說、現量說和神理說等詩學理論，以及選本的選評思想與特色。此外，學界也關注王夫之對諸家的選評情況，¹¹杜甫是其中最受學者重視的詩人，¹²前人相關研究都有助於了解王夫之批評杜甫的諸多面向與原因。與本文議題有關的研究，如陳美朱老師爬梳陸時雍（1590？-1639？）與王夫之兩家唐詩選本中「尊杜」與「貶杜」的矛盾，並釐清陸時雍與王夫之選錄杜詩數量最多的深意。¹³論文以比較的研究方法，凸顯陸時雍和王夫之選評杜甫的特殊之處，對於理解王夫之嚴詞批評杜甫，《唐詩評選》卻選錄最多杜詩的緣由有所助益。

本文將分析《唐詩快》、《唐詩評選》選錄杜詩之情形，以及黃周星和王夫之對杜詩的評論內容，呈現出兩書對杜甫的接受情形，並以此探究兩家對杜甫評價差異的意義，期望藉由兩部選評標準與眾不同的唐詩選本，了解明遺民對杜甫的不同理解視角。

二、《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共同選錄的杜甫詩題

《唐詩快》和《唐詩評選》選詩數量最多的詩家皆為杜甫，但檢視《唐詩快》與《唐詩評選》皆選錄的杜詩評論，仍可發現黃周星和王夫之對相同的詩作，存在相似與相異的評論。比較《唐詩快》和《唐詩評選》皆收錄的杜詩評語，並將相似的詩評內容整理為下表：

¹⁰ 參見黃瓊：《〈唐詩快〉研究》，頁3-5。

¹¹ 除了杜甫外，也有研究論及陶淵明（約365-427）、謝靈運（385-433）、李白（701-762）等詩人，如張晶、張佳音：〈從對陶謝評價的軒輊看王夫之的詩學觀念〉，《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2015年5月），頁56-62；鄒國平：〈王夫之論李白〉，收入中國李白研究會編：《中國李白研究（2006-2007）》（合肥：黃山書社，2007年），頁209-223。

¹² 檢索「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及「中國知網」等論文資料庫，以王夫之評杜甫為主題的臺灣期刊論文有8篇，臺灣學位論文計1本，中國期刊論文共9篇，中國學位論文則有4本，學界對於王夫之評杜的議題已有諸多討論，茲僅舉其舉大者。期刊論文如朱迪光梳理杜詩被聖化的時代脈絡，著重在王夫之批評杜甫的面向及其對近代學界的影響力，見氏著：〈聖化杜詩的解構及其影響——論王夫之評杜〉，《學術論壇》2010年第6期（2010年6月），頁131-135。郭瑞林批評王夫之對杜甫抱持嚴重偏見，並釐清其貶杜的原因，見氏著：〈千古少有的偏見——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詩〉，《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頁82-87。鄒國平等認為，王夫之對杜甫的看法兼具「尊杜」和「貶杜」，進而指出王夫之選評杜詩的意義和缺點，見鄒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1期（2001年3月），頁55-61。學位論文有吳靜慈梳理王夫之對杜甫的詩歌、人品和詩品的評價，以此探索王夫之的批評依據和方法。見氏著：《王船山評杜詩之研究》（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¹³ 陳美朱：〈尊杜與貶杜——論陸時雍與王夫之的杜詩選評〉，《成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12年6月），頁81-105。

表二 《唐詩快》與《唐詩評選》中對杜詩評論角度相似的評語

詩作	《唐詩快》評語	《唐詩評選》評語
〈晚出左掖〉後評	「樓雪融城」、「宮雲去殿」與「欲雞樓」三字，皆倒錯句法，惟老杜長于用此。(卷 9，頁 1a)	「樓雪」一聯是回望景，為晚出傳神，得句精微，是此翁獨契。(卷 3，頁 1016)
〈題張氏隱居〉後評	「不貪」一聯，不獨為見理名言，足可參禪悟道。(卷 11，頁 9b)	「不貪」句奇創。(卷 4，頁 1086)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後評	七歌體創自少陵，後乃轉相摹倣，然無如此之悲切。(卷 2，頁 12b)	〈七歌〉不紹古響，然唐人亦無及此者。……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為之，一倍惹厭。……杜本色極致，為此〈七歌〉一類而已，此外如夔府詩，則尤入俗醜。(卷 1，頁 915)
〈夜宴左氏莊〉後評	自是名詠，可以千年不宿。(卷 9，頁 8b)	自然。 好律詩，不媿其祖。(卷 3，頁 1023)

對照上表的評語，《唐詩快》和《唐詩評選》皆認為只有杜甫，才能寫出如「樓雪」一聯的精妙佳句，也同樣針對「不貪」一聯評論其優點。對於〈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黃周星和王夫之都指出杜甫開創七歌體，後人擬作卻不得要領，不如杜甫原作的情感真摯悲切，王夫之甚至推尊其為杜詩的「本色極致」。此外，兩家以「名詠」、「好律詩」讚賞〈夜宴左氏莊〉，稱此詩為杜甫五律佳作。

然而，即便黃周星和王夫之對上述杜詩有相近的評語，但結合選錄重疊的數量來看，這些相似看法其實僅為選本中的少數，只是兩家「英雄所見略同」而已，未必能代表兩家論詩觀點一致。相較之下，更值得關注的是兩家以不同的角度，對共同選錄的杜詩評論，如評〈後出塞〉其二：

少陵〈前〉、〈後出塞〉共十四首，童時即誦此一首，頗喜其風調悲壯，及今反覆點勘，仍不出此一首。李鍾兩家並選之，豈為無見。(《唐詩快》，卷 4，頁 17b)

養局養法，偏於刻畫至極中得不滌汰，但此一空群馬。(《唐詩評選》，卷 2，頁 958)

觀察兩書的評論，同樣都是肯定此詩，但兩家的評論視角不同。黃周星常以欣賞詩歌的態度，抒發個人體悟，如點出收錄此詩的原因，與自己主觀的童年經驗、審美偏好有關，並以復古派、竟陵派的選本皆收錄此詩為證，加強自身論點的說服力。與之相比，王夫之則針對杜甫的表現手法，稱讚其刻畫極深且張弛有度，顯得他人詩作較為平庸。又如描寫湘夫人祠的〈祠南夕望〉，黃周星感受到詩作有「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¹⁴的享祀無窮之意，(《唐詩快》，卷 9，頁 6a) 閱讀〈紫宸殿退朝口號〉時，感覺「花光柳影，環珮冠裳」的景象歷歷在目；(《唐詩快》，卷 11，頁 5a) 王夫之則稱許〈祠南夕望〉中的「色」字，字法幻妙而寫景真實；(《唐詩評選》，卷 3，頁 1022) 對於〈紫宸殿退朝口號〉，則注意到杜甫體物細微的優點，同時藉此批評〈玉華宮〉「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帶有過多鬼氣。(《唐詩評選》，卷 4，頁 1088)

另外，黃周星也偏好點出詩作蘊含的真情，如評〈落日〉結句提到「此老（杜甫）胸中，豈非萬物一體？」(《唐詩快》，卷 9，頁 4a) 評〈哀王孫〉云「屢喚王孫，一喚一哀，幾於泣涕如雨矣。」(《唐詩快》，卷 6，頁 13b) 對於〈贈衛八處士〉則認為「此首無甚奇妙處，既逸而復收之，不過一真。」(《唐詩快》，卷 4，頁 22b) 諸多評語都聚焦在杜詩的真摯深情。對於相同的杜詩，王夫之仍關注在其寫作手法，如評〈落日〉的結語褊小，卻能寫出波瀾起伏的氣勢；(《唐詩評選》，卷 3，頁 1022) 而從〈哀王孫〉「世之為情事語者苦於不肖，唯杜苦於逼肖。畫家有工筆、士氣之別，肖處大損士氣。此作亦肖甚，而士氣未損」，(《唐詩評選》，卷 1，頁 913) 以及〈贈衛八處士〉「每當近情處即抗引作渾然語，不使氾濫。熟吟〈青青河畔草〉當知此作之策。杜贈送五言能有節者，唯此一律」(《唐詩評選》，卷 2，頁 962) 的評語，可看出王夫之指出杜甫抒情詩容易有「逼肖」、損害士氣的缺點，而此二詩之所以受到肯定，是因為「士氣未損」，以及在近情處作渾然語，使情感不致氾濫寫作策略。

王夫之評論詩作的同時，也會延伸探討其他議題，比較黃周星和王夫之對〈新婚別〉的評語：

少陵〈新安〉、〈石壕吏〉，與〈新婚〉、〈垂老〉、〈無家別〉五篇皆可泣鬼，而此篇尤為悲慘。(《唐詩快》，卷 2，頁 1b)

〈出塞〉、〈三別〉以今事為樂府，以樂府傳時事，胎骨從曹子桓來。意韻婉切，其或傷於煩縛，而至竟與白香山有雅俗之別，當於其開合生活求之。
(《唐詩評選》，卷 2，頁 959)

¹⁴ [宋]朱熹集注，蔣立甫校點：《楚辭集注·離騷九歌·禮魂》，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2，頁62。

黃周星認為〈新婚別〉是〈三吏〉、〈三別〉中，最為悲慘動人的詩作；而王夫之則指出杜甫以今題樂府反映時事的特色，可溯源至曹丕（187-226），並將杜甫的今題樂府，與白居易（772-846）的新樂府比較，判斷兩人的雅俗高下，杜甫偶有瑣碎的缺失，但因內容委婉含蓄、章法結構生動，故仍較白居易為雅，¹⁵這種評論方式正是從詩體發展的角度，指出前後傳承的關係。¹⁶儘管如此，王夫之仍對此詩有所不滿：「〈新婚別〉儘有可刪者，如『結髮為妻子』二句，『君行雖不遠』二句，『形勢反蒼黃』四句，皆可刪者也。……言有餘則氣不足。」（《唐詩評選》，卷 2，頁 960，〈無家別〉後評）以批評詩中「言有餘」而應刪去的詩句，來表達貶意。此外，王夫之還借題發揮云：

凡俗物殢人，大約死中無活理，拈著即不能開。古今通病。必有病根，奈醫病之藥不易得爾。若此種詩，於己無病，要不能為人作藥。取材李、杜者，終以李為三年之艾。（《唐詩評選》，卷 2，頁 959）

認為〈新婚別〉這類詩作有直白敘事而流俗之弊病，指責其為「死中無活理」的俗物，並讚揚李白較杜甫更少用直敘手法，以此判定李、杜作為學詩典範的高下。

除此之外，《唐詩快》和《唐詩評選》也有選詩相同，但意見截然不同的評論，例如對〈詠懷古跡〉其三的評價：

昔人或評「羣山萬壑」句，頗似生長英雄，不似生長美人，固哉斯言，美人豈劣於英雄耶？（《唐詩快》，卷 11，頁 7a）

首句是極大好句，但施之于「生長明妃」之上，則佛頭加冠矣。故雖有佳句，失所則為疵類。（《唐詩評選》，卷 4，頁 1095-1096）

同樣評論首句「群山萬壑赴荊門」，黃周星提到前人認為此句的氣勢雄壯，不適合用來形容生長美人之地，但黃周星對此感到不以為然，甚至認為美人與英雄不分優劣；王夫之雖肯定首句是佳句，卻以「佛頭加冠」比喻杜甫造語不當的缺失。又如對杜甫七律名篇〈秋興八首〉的去取，兩家看法也是大相逕庭：

此即八首之一也，較有別致，故獨收之。（《唐詩快》，卷 11，頁 5b）

¹⁵ 王夫之評〈遣興四首〉其二提到：「上古人作一直語，必不入人意中，直而可以人意射得者，元、白之所輕俗也。」元、白之所以輕俗，是因為詩句直率且爛熟。見氏著：《唐詩評選》，卷 2，頁 956。此外，陳美朱老師指出，《唐詩評選》選錄的元、白詩數量很少，且不收元、白為人稱道的「長慶體」詩作，印證王夫之對元、白的貶抑態度。見氏著：〈尊杜與貶杜——論陸時雍與王夫之的杜詩選評〉，頁 99。

¹⁶ 陳伯海等著：《唐詩學史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629-630。

八首如正變，七音旋相為宮而自成一章；或為割裂，則神體盡失矣。選詩者之賊不小。（《唐詩評選》，卷4，頁1093）

黃周星僅選錄〈秋興八首〉其一的「夔府孤城落日斜」，原因是「較有別致」；王夫之則是八首皆選，且於第一首的後評，開宗明義地指出〈秋興八首〉為完整的一體，破壞連章結構則使「神體盡失」，故貶斥刪選〈秋興八首〉的選詩者。

綜上所述，《唐詩快》和《唐詩評選》選錄杜詩的重疊數量和比例本就不高，而梳理兩書共同選錄的杜甫詩題，發現論點相似的評語，多聚焦在肯定杜詩的寫作手法和詩歌成就。至於兩家評杜的相異處，黃周星以個人主觀的閱讀經驗，闡揚杜詩的真摯情感，王夫之的評語則多針對字句章法，並延伸討論雅俗、學詩典範等其他議題。此外，兩家對於〈秋興八首〉的連章結構，則抱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藉由比較《唐詩快》和《唐詩評選》皆選的杜詩評語，可以了解黃周星和王夫之雖同為明遺民，擁有相似生命經驗，但兩家對相同杜詩的解讀迥然不同。下文將透過《唐詩快》和《唐詩評選》獨選的杜詩，考察兩家各自偏好的杜詩樣貌。

三、《唐詩快》與《唐詩評選》選評杜詩之相異面貌

《唐詩快》與《唐詩評選》獨選的杜詩佔大宗，從這些獨選詩作評語，可以發現兩家欣賞的杜詩面向不同，以下將從風格筆法和內容情感兩方面分別討論。

（一）風格筆法

《唐詩快》標舉的詩作包含「不但飄飄有仙氣，亦且拂拂有酒氣」的〈飲中八儂歌〉、（《唐詩快》，卷6，頁14b）「老氣橫九州」的〈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唐詩快》，卷6，頁16a）「豪橫奔騰，不可一世」的〈醉時歌〉，（《唐詩快》，卷6，頁17a）以及起句「有排山倒海之勢」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唐詩快》，卷6，頁19b）。黃周星評〈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時，引用鄭善夫（1485-1523）的說法，認為此詩含有「雄心銳氣，奮發飛騫」的壯志。（《唐詩快》，卷4，頁24a）此外，《唐詩快》收錄了兩首〈望嶽〉，並指出各自的特色：

同一望嶽也，「齊魯青未了」，何其雄渾，「諸峰立兒孫」，何其奇峭，此老方寸間，固隱然有五嶽。（《唐詩快》，卷11，頁6b，〈望嶽〉後評）

兩首〈望嶽〉分別為五古「岱宗夫如何」、七律「西嶽峻嶒竦處尊」，前者寫出泰山雄偉磅礴的氣勢，後者則描繪華山的高聳奇峭。被譽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詩」

¹⁷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黃周星評道：「寫出意外驚喜之況，有如長江放溜，駿馬注坡，直是一往奔騰，收拾不住。」（《唐詩快》，卷 11，頁 5b）以舟船順流自行、駿馬疾馳而下的比喻，說明此詩的筆法流暢、氣勢奔放。

此外，黃周星也多強調杜甫的筆法奇崛高妙，如〈春日江村〉後評提到：「章法奇，『羣盜哀王粲』，句法亦奇。」（《唐詩快》，卷 9，頁 5a）又稱許〈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和〈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兩詩的起句「如高巖墜石，筆力千鈞」、「筆力俱足千鈞」；（《唐詩快》，卷 1，頁 2a、3a）特賞「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一句的「筆法妙絕，古今未有」；（《唐詩快》，卷 2，頁 2a，〈北征〉）點出「賦料楊（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以兩古、兩今的人名入詩，手法「殊為奇肆」。（《唐詩快》，卷 4，頁 21b，〈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甫的筆法還能化腐朽為神奇，黃周星評論「乾坤一腐儒」句，「與『乾坤一草亭』，俱爛熟于人口中，然愈熟愈覺其妙者何故。」（《唐詩快》，卷 6，頁 5b，〈江漢〉）將熟句視為杜詩的妙處所在。〈寄韓諫議注〉的奇特章法，也受到黃周星的青睞：

顛倒錯雜，不倫不理，讀之不知所指何人，所說何事。即韓諫議亦目瞪口呆，茫然不解，然不得言其不妙。（《唐詩快》，卷 6，頁 17a，〈寄韓諫議注〉後評）

章法「顛倒錯雜，不倫不理」，詩中描寫的人、事讓人捉摸不定，這也是黃周星認為此詩高妙的原因。

與黃周星不同，王夫之認為杜詩的優點不在豪放詩風，王夫之欣賞的杜詩風格，例如〈閨水歌〉的「恬雅」、（《唐詩評選》，卷 1，頁 916-917）〈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的「輕俊中自有風力」；（《唐詩評選》，卷 1，頁 917）以及〈前出塞二首（單于）〉和〈無家別〉的「平淨得力」。（《唐詩評選》，卷 2，頁 957、960）〈倦夜〉的「清適」（《唐詩評選》，卷 3，頁 1020-1021）、〈廢畦〉的「清貴」（《唐詩評選》，卷 3，頁 1022-1023）也是王夫之感興趣的風格，而對於〈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和〈即事〉，王夫之則點出詩作「自然」、「純淨」的特點。（《唐詩評選》，卷 4，頁 1088、1096）

《唐詩評選》評杜常提及平淨、輕俊、清適、純淨的風格，至於王夫之所關注的筆法，則是以含蓄蘊藉為美，王夫之讚賞杜甫云：「情語能以轉折為含蓄者，唯杜陵居勝」，並舉「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柔艣輕鷗外，含棲覺汝賢」兩詩為例，¹⁸此二詩同樣收錄在《唐詩評選》中，前者是〈秦州雜詩二首〉其二

¹⁷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4，頁628。

¹⁸ [明]王夫之撰：《薑齋詩話》，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的尾聯，王夫之評此詩曰：「『月明垂葉露』險句出之平夷，即如末一語有兩轉意，而混成不覺，方可謂意句雙收。」（《唐詩評選》，卷3，頁1018）點出險句卻有平夷特色，以及末句有兩層轉折，而令人感覺渾然一體，是「意句雙收」的佳句；後者則出自〈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被王夫之譽為「深潤秀密，杜出峽詩方是至境。」（《唐詩評選》，卷3，頁1020）可見王夫之對此詩的大力讚賞。

對於其他《唐詩評選》中獨選的杜詩，王夫之的評論也多點明含蓄蘊藉的筆法，如評〈秋興八首〉其五的章法「無起無轉，無敘無收，平點生色」，（《唐詩評選》，卷4，頁1094）〈遣興四首〉其二和其四「宛折有神，乃以直承魏晉」、「點染處，寓婉於直，良足嗣應璩〈百一〉之響」（《唐詩評選》，卷2，頁956、957），以及〈野老〉的「境語蘊藉，波勢平遠」。（《唐詩評選》，卷4，頁1091）不僅正面指出詩作平、宛折、蘊藉的優點，王夫之也以「怪悍之氣，銷之欲盡」的反面論述，稱許〈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的句法「轉折合一，造句如沐峽中」。（《唐詩評選》，卷3，頁1059）

要之，黃周星喜好杜詩豪邁奔放的風格，以及奇崛高妙的筆法；王夫之則是以「平」的審美論詩，賞識杜詩平淨、清適的樣貌，強調含蓄蘊藉的委婉筆法。

（二）內容情感

詩作的內容情感也是選家評論之要點，黃周星的評語於此處多有著墨。黃周星傾向選錄杜甫懷念哀傷親人、朋友之詩，如回憶全家逃難情況的〈彭衙行〉、有感從弟之死而作的〈不歸〉、與弟惜別的〈送舍弟顥赴齊州〉等，黃周星都評論詩作情感「真可泣鬼」、（《唐詩快》，卷2，頁4b）「痛絕」、（《唐詩快》，卷3，頁3a）「極淺極淡而極酸楚」。（《唐詩快》，卷9，頁10a）至於思念或感慨友人遭遇的〈夢李白二首〉其二和〈贈別何邕〉，黃周星點出詩作「情至苦語，人不能道」、（《唐詩快》，卷2，頁5b）、「首二語悲甚」（《唐詩快》，卷9，頁9a）的真情動人。又如哀悼朋友的〈存歿口號二首〉其二，黃周星體察詩作情感而評曰「過於痛哭」。（《唐詩快》，卷15，頁9b）此外，兼具寫實與寄託的〈佳人〉、感慨自傷的〈天育驃騎歌〉與〈江漢〉「古來存老馬」，評語也都提到「令人淒然欲淚」、（《唐詩快》，卷4，頁18a）「足使千古英雄一齊墮淚」（《唐詩快》，卷6，頁19a）和「語悲甚」，（《唐詩快》，卷9，頁5b）可見黃周星評詩多以體會詩中的悲痛情感為主。

杜甫忠愛之作也受到《唐詩快》的關注，黃周星引用洪邁（1123-1202）《容齋續筆》「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的論點，藉由稱讚洪邁為杜甫知己，推

崇杜甫的忠君愛國；(《唐詩快》，卷 9，頁 2b)也能藉由〈蜀相廟〉，領會詩歌興觀羣怨的功能與意義；(《唐詩快》，卷 11，頁 6a)或是點出〈杜鵑〉詩對人倫世道的思考，使他有所感悟。(《唐詩快》，卷 4，頁 20a)又如〈收京三首〉其二、「間道暫時人」、「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和「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黃周星指出這些詩句有「無限悲喜」、(《唐詩快》，卷 9，頁 1b)「五字令人迸淚」、(《唐詩快》，卷 3，頁 2a)「至性語令人墮淚」、(《唐詩快》，卷 4，頁 19a)「一字一淚」(《唐詩快》，卷 9，頁 2a)的特點，而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黃周星也肯定其為「自道素志耳，非大言也」，(《唐詩快》，卷 4，頁 21b)對於「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則讚賞其刻畫之深，難能可貴。(《唐詩快》，卷 9，頁 2a)總之，黃周星偏好情感真摯深沉，甚至是哀痛可哭的作品，同時也非常推崇杜甫忠愛、關懷社會的「詩聖」形象。

與之相反，王夫之主張「情景一合，自得妙語」，¹⁹情感的表達以含蓄為佳，故抒情時不可直敘情語，應該透過情景的互動相合，自然而然地寫出佳句，進而達到「化工之妙」的境界。²⁰對於情景關係的論證，則云：「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唐詩評選》，卷 4，頁 1083，岑參〈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所謂生情之景，是詩人對客觀景物產生共鳴，觸景生情；情中之景，則是詩人將主觀情感投射在景物中，寓情於景。²¹由於強調情景交融的手法，王夫之評論杜詩也是從情中景、景中情的角度出發，《薑齋詩話》提到標舉的典範為：

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影靜千官裡」，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之景。²²

引文中的詩句出自李白〈子夜吳歌〉、杜甫〈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三，以及〈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王夫之拈出「長安一片月」和「影靜千官裡」的景語，認為詩人能觸景生情，透過對客觀景物的描寫，自然表現出「孤棲憶遠」、「喜達行在」的情思；王夫之讚賞「詩成珠玉在揮毫」，以曲筆描寫的方式寓情於景。值得注意的是，被當作情景相合典範的兩首杜詩，皆見於《唐詩評選》，王夫之表示：

¹⁹ [明]王夫之著：《明詩評選》，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4冊，卷5，頁1434，沈明臣〈渡峽江〉後評。

²⁰ 王夫之云：「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見氏著：《薑齋詩話》，卷下，頁14，27條。

²¹ 蔡鎮楚：〈船山詩話與中國傳統文化〉，《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1988年4月），頁31。

²² [明]王夫之撰：《薑齋詩話》，卷下，頁11，14條。

悲喜亦於物顯，始貴乎詩。「影靜千官裡」寫出避難倉皇之餘，收拾仍入衣冠隊裡一段生澀情景，妙甚。非此則千官之靜，亦不足道也。（《唐詩評選》，卷3，頁1017，〈喜達行在所〉）

平起順轉。「香煙攜滿袖」非浪語，實有景在。「珠玉在揮毫」形容才子語，快甚！（《唐詩評選》，卷4，頁1087，〈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唐詩評選》也再度提示〈喜達行在所〉的景中之情，進一步說明「影靜千官裡」的情景相合之妙，故能成為杜詩佳作。對於〈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則在指出「平起順轉」的手法之餘，推崇頸聯描繪出真實景象，讀之大快人心。

王夫之同樣以情景交融的標準，檢視杜詩的情感表達，觀《唐詩評選》獨選的其他杜詩與評語：

全於韻得古，乃其得韻又在開合詳略之間，若一往無餘，愈入情愈鄙倍矣。
（《唐詩評選》，卷2，頁957，〈前出塞二首（送徒）〉）

俗目或喜其近情，畢竟杜陵落處全不關近情與否，如此詩篇只是一雅。（《唐詩評選》，卷2，頁961，〈成都府〉）

起二句得未曾有，雖近情而不俗。「親朋」一聯情中有景，「戎馬關山北」五字卓煉，此詩之佳亦止此。（《唐詩評選》，卷3，頁1017，〈登岳陽樓〉）

〈前出塞〉之所以入選，是因為在開合詳略的布局之間，蘊含溫柔敦厚的古韻，避免了情感直露的缺失；讚賞〈成都府〉的好處不在近情，而在於雅。對於〈登岳陽樓〉，王夫之詳細分析詩作結構，起句是杜甫書寫自己的親身經歷，故合乎人情，同時又不過於直白氾濫，使頸聯能達到情中有景的效果。此外，王夫之在《薑齋詩話》也有相關評論：「『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相為融浹。」²³由於杜甫描繪的景色是眼前真實所見，而此景與詩人的情感相合，故詩作能「近情不俗」，情景「相為融浹」。徐國能為文指出，王夫之判斷詩作的標準是「關情」與「現量」，被王夫之認定為「俗」的杜詩，皆因「關情」不足且過度超越「現量」，抒發太多自我的情志，以至於入俗。²⁴所謂「現量」之意，王夫之曰：

²³ [明]王夫之撰：《薑齋詩話》，卷上，頁6-7，16條。

²⁴ 徐國能：〈以「俗」論杜辨析〉，《淡江中文學報》第20期（2009年6月），頁27。

現者，有現在義，有現成義，有顯現真實義。現在，不緣過去作影。現成，一觸即覺，不假思量計較。顯現真實，乃彼之體性本自如此，顯現無疑，不參虛妄。²⁵

蕭馳指出，王夫之以佛教唯識學義涵統括詩歌的生成，並綜合「現在義」、「現成義」和「顯現真實義」，解釋王夫之所謂的「現量」為：

詩人應在其有所懷來之當下，於流動洋溢之天地間「取景」，取景應不加追敘、不假思量、不參虛妄，而顯現其體相之本來如此。²⁶

也就是詩人應藉由「眼、耳、鼻、舌、身」五根，以及第六根「意根」的直接緣境，寫景時具體呈現所見所聞，不假雕飾、不憑空想像。

除此之外，王夫之用正反對比的方式，說明何為含蓄蘊藉之詩：

結撰不淫，只如此寄哀已足。何用「人少虎狼（豺虎）多」、「癡女飢咬我」、「呻吟更流血」而後為悲哉？且彼諸惡悰語，又豈能出此圈縑邪？（《唐詩評選》，卷 3，頁 955-957，〈遣興四首（蓬生）〉）

王夫之認為結句「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哀而不傷，情感含蓄不過份外放，反之，如〈送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人少虎狼（豺虎）多」、〈彭衙行〉「癡女飢咬我」和〈北征〉「呻吟更流血」，王夫之批評這些詩句過於直露，不符合含蓄蘊藉的內涵，因此《唐詩評選》皆絀落不選。

總而言之，《唐詩快》和《唐詩評選》在選評杜詩上的差異，主要集中在對杜詩風格筆法、內容情感的品味不同，黃周星欣賞雄渾壯闊、豪邁奔放的詩風，評語多關注詩中奇崛高妙的筆法，且對深情動人的內容頗有感觸；王夫之推崇「平」的風格，故而強調委婉含蓄的筆法，認為詩作應情景交融，情感含蓄不外露。《唐詩快》與《唐詩評選》透過選評呈現出杜甫不同的樣貌，此現象背後的意義值得深入探究。

四、黃周星、王夫之選評杜詩差異所代表的意義

²⁵ [明]王夫之著：《相宗絡索》，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3冊，頁536-537。

²⁶ 蕭馳：〈船山詩學中「現量」義涵的再探討：兼論傳統「情景交融」與相關系統思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 第三卷：聖道與詩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第二章，頁67。

《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偏好的不同，塑造出的杜甫形象也大相逕庭，本節將討論差異背後的意義，由兩家的詩觀差異切入，進而延伸到晚明的時風。

(一) 選家詩觀差異

《唐詩快》和《唐詩評選》選錄的杜詩風格、情感差異頗大，究其根本原因，應與兩家的論詩宗旨有關。黃周星在〈唐詩快自序〉中，自言本書的選詩理念與標準：

僕今者《詩快》之選，則不惟其世而惟其人，不惟其人而惟其詩，又不惟其詩而惟其快。……其為選則虛公平直，毫不敢以成心偏見參之，不問穠澹淺深，惟一以性情為斷。初則去其不快者，取其快者，既乃去其差快者，取其最快者。(〈唐詩快自序〉，卷前，頁 5a-5b)

黃周星提出《唐詩快》的特色，是「不惟其世而惟其人，不惟其人而惟其詩，又不惟其詩而惟其快」，對時代、詩人或詩作，都不抱持先入為主的偏見。選詩方式則是依照自身性情裁斷詩作，刪汰不快、差快者，僅選錄最快者。郭蘇夏認為，「快」乃「性情」的側面描述，是讀者閱讀時感受到的「快意」，這種情緒並非出於儒家強調的詩教觀，而是偏於世俗的、感官化的、個人的。²⁷至於黃周星如何以性情評判詩作是否為快者，其云：

使我一人讀之歌哭叫跳不已，人人讀之亦歌哭叫跳不已。而千古以上之詩人相與歌哭叫跳於前，千古以下之詩人，相與歌哭叫跳於後。則我一人之心快，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俱快，是則僕之私志也。(〈唐詩快自序〉，卷前，頁 6b)

黃周星自身性情所認定的快詩，是能使其「歌哭叫跳不已」、情緒強烈起伏之作，並同時主張「我一人之心快，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俱快」，強調自己從所選詩作中體會到的快感，古人、今人乃至後人都能和他有一樣的感受，快詩因此具備超越時空限制的普遍性。

在《唐詩快》中，也得見黃周星評論詩作之「快」，例如：

伯敬云：「讀太白詩，當於雄快中察其靜遠精出處。」又云：「太白有飲酒、學儻兩路語，資淺俗人口角。」言俱不謬。若如此等詩，則有雄快而無淺俗矣。他如〈襄陽歌〉、〈梁園吟〉、〈扶風豪士〉、〈夢遊天姥〉諸作，非不

²⁷ 郭蘇夏：〈黃周星《唐詩快》的綜合向度與悲劇意味〉，《中國詩歌研究》2024年第1期（2024年7月），頁231。

雄快可喜，然終不敢入選者，誠恐如伯敬所評跋耳。(《唐詩快》，卷 6，頁 12a，李白〈廬山謠寄盧侍郎虛舟〉後評)

此等詩氣味淳朴，閱之似不甚快人意，然初唐佳咏寥寥，若并此等去之，則無詩矣，故不得不約畧存之。(《唐詩快》，卷 8，頁 9b，孫逖〈楊子江樓〉後評)

評語如實反映黃周星將「快」作為選詩標準，如稱許李白的雄快詩風，對於同樣雄快的飲酒詩，如〈襄陽歌〉、〈梁園吟〉、〈扶風豪士歌〉，以及具有遊仙描寫的〈夢遊天姥吟留別〉，卻都絀落不選，換言之，在黃周星看來，這些詩作仍有鍾惺所言的淺俗缺失。又如評論孫逖的〈楊子江樓〉，黃周星認為此詩不甚快意，但顧及初唐五律的佳作數量有限，故在權衡之下仍勉強收錄。

《唐詩快》以快為選詩要旨，黃周星同時還提到選評的其他特點：

於中釐爲三集，曰驚天、泣鬼、移人，移人則人快，驚天則天快，泣鬼則鬼亦快。而且人快則移人者尤快，天快則驚天者尤快，鬼快則泣鬼者尤快，蓋一快則無不快也。(《唐詩快自序》，卷前，頁 5a-5b)

選本體例按照驚天、泣鬼和移人的主題編排，黃周星認為「一快則無不快」，凡是驚天、泣鬼和移人的詩作都能讓人感到快意、痛快，亦即三者的核心皆為快。黃周星也在卷前以題記說明何謂驚天、泣鬼和移人之詩。〈題驚天集〉云：

天以風雷驚人，人以文章驚天。風雷者，天之文章；文章者，人之風雷也。
(卷前，頁 1a)

黃周星將風雷視為天的文章，而文章則是人之風雷，故天、人得以風雷、文章為互動的媒介，文章因此擁有驚天的可能。並引李賀(790-816)〈李憑箜篌引〉為例，論證確實有驚天的詩文存在，而在黃周星的定義中，所謂的驚天詩，要與〈坤卦〉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或是揚雄(53B.C.-18)《太玄·劇》上九「海水羣飛，蔽於天杭」的驚天語相類。(卷前，頁 1b) 驚天集收錄的杜詩有〈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與〈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黃周星評曰：

如此長篇，具有獅子跋太行之力，少陵真詩中五丁手也。(《唐詩快》，卷 1，頁 3a，〈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後評)

閃爍怕人，「子璋觸體」之句，可以辟瘡，何不用此句乎？（《唐詩快》，卷 1，頁 3a，〈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夾批）

稱許杜甫的長篇七古〈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如傳說中能移山的五位力士般力大無窮；對於杜甫讚美曹霸（694-？）畫技高超、躍然紙上的詩句，黃周星甚至認為較〈戲作花卿歌〉「子章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句，更具有「辟瘡」療傷的生氣。

黃周星在〈題泣鬼集〉提到「泣鬼」一詞的運用，出自賀知章（659-744）對李白（701-762）〈烏棲曲〉的稱讚，杜甫便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讚揚李白的詩歌成就。黃周星又以李賀〈綠章封事〉（又名〈爲吳道士夜醮作〉）「願攜漢戟招書鬼」，以及〈秋來〉「秋墳鬼唱鮑家詩」這類與鬼相關的詩句，解釋何為泣鬼詩。值得注意的是，黃周星論泣鬼與詩的關係云：

夫鬼能泣詩，詩亦能泣鬼，鬼詩之與詩鬼，正未知是一是二。……吾所取於泣鬼者，其必以佳詩而挑佳鬼，以佳鬼而拜佳詩乎！噫！鬼猶如此，人何以堪？（卷 2，頁 1a-1b）

與論驚天意涵的方式相同，黃周星都以回文修辭連結詩和天、詩和鬼，以此表明《唐詩快》選錄真正的驚天、泣鬼之詩。泣鬼集入選數量最多的是杜詩 21 首，與「泣鬼」相關的評語如：

此非泣鬼詩也，然誦湘娥、百靈二語，其中定有鬼泣。（《唐詩快》，卷 2，頁 5a，〈贈蘇侍御渙〉）

指出〈贈蘇侍御渙〉僅為贈答詩，並非哀悼之作，但他認為「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的情感深沉，如有鬼泣。又如評〈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曰：

少陵五古中無限奇崛之語，如「百祥奔盛明」，「皇天照嗟嘆」，「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之類，俱可驚人泣鬼。奈全篇不稱，不能槩收，可勝悵嘆。（《唐詩快》，卷 4，頁 24b）

提到杜甫五古〈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和〈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等詩，雖其中有「無限奇崛」、「驚人泣鬼」的佳句，卻因非佳篇而不入選的遺憾。值得注意的是，黃周星因「湘娥、百靈二語」有鬼泣而收錄〈贈蘇侍御渙〉，卻又因「全篇不稱，不能槩收」而刪汰〈奉同

郭給事湯東靈湫作〉等詩，一方面呈現出黃周星以個人喜好為主的選詩結果，但同時也可說是詩學理論不夠圓滿，去取標準不一而產生的矛盾。

至於〈題移人集〉，黃周星先以人的精神情態，並非禮樂、政教或兵刑可以改變的，反觀有「一物」可以輕而易舉地改變人心，也就是《左傳》提到的：「夫有尤物，足以移人。」²⁸然而，黃周星也提到：

然此物安可多得，則思得近似者以充之。詩也者，文章中之尤物也。孔子詔小子學詩，而曰興、觀、羣、怨之四者，以言詩可，以言尤物亦可。（卷4，頁1a）

因尤物難得，而將詩歌比喻為文章中的尤物，並說明詩具有「興觀群怨」與移人的作用。《唐詩快》的評杜詩例證，如〈九日寄岑參〉「出門復入門，雨腳但如舊」夾批曰「情境宛然」，（《唐詩快》，卷4，頁23a）而後評則云「分明一首苦雨詩，只『岑生多新詩』二語，是寄岑耳，然語語與寄岑無異。」（《唐詩快》，卷4，頁23b）黃周星認為此詩從字面意義看僅是描寫久雨不止，但在詩句所描述的情境中，處處可見杜甫對岑參（715-770）的懷念之意。又如評〈渼陂行〉云：

此詩不過遊渼陂耳，卻說得天搖地動，雲飛水立，悄然有山林窅冥，海水汨沒景象，豈不令人移情。（《唐詩快》，卷6，頁15b）

黃周星指出杜甫以大量的誇飾和想像手法，描寫遊渼陂所見所感，評語扣合伯牙（387-299B.C.）向成連（？-？）學琴三年未成，而後伯牙在東海仙境中，受自然景物感動，有所領悟，而感嘆「先生將移我情」的典故。²⁹由上述黃周星評杜的內容可知，《唐詩快》傾向選錄風格雄渾豪放、筆法高妙奇崛、情感真摯深沉的杜詩，其原因與驚天、泣鬼和移人的主題有關，此三者都不脫離快的核心主旨。

《唐詩評選》並無王夫之的自序與凡例，但透過詩作的評語和前人的相關研究，可以清楚了解王夫之的詩觀。《唐詩評選》形塑的杜詩樣貌，與王夫之「以平為貴」的審美有關，涂波歸納「平」包含自然、蘊藉、從容和浹洽的內涵，四種意義皆來自平舒的本義。而王夫之提倡「平」的審美，是為了矯正明代詩壇的怪戾、俗戾之氣，攻擊以李攀龍為首的復古派後七子，以及鍾、譚等竟陵派。而「平」之所以能褒貶詩歌，與王夫之「詩道性情」的主張密切相關。³⁰王夫之闡

²⁸ [周]左丘明撰，楊伯峻編著：〈昭公二十八年〉，《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頁1493。

²⁹ [唐]吳兢：〈水仙操〉，《樂府古題要解》，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卷下，頁9a。

³⁰ 涂波：〈說「平」——王夫之詩學批評中的重要概念〉，《船山學刊》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11、13。

釋詩的功能為：「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³¹性情是宋明理學的基本命題，王夫之在此將詩定義為「道性之情」的抒情功能。然而，王夫之不認同情的過分張揚，故從哲學角度論述心、性、情的關係，提出解方：「心統性情，而性為情節。」³²心統攝性情，而情可以為性所節制，使之發用有度，避免近情入俗的弊病。由於主張情應有所節制，故而重視溫柔敦厚、含蓄蘊藉的詩教傳統：

故聞溫柔之為詩教，未聞其以健也。健筆者，酷吏以之成爰書而殺人。藝苑有健訟之言，不足為人心憂乎？況乎縱橫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問津。³³

蔣寅批評王夫之執著詩教，僅以溫柔敦厚、委婉曲折為美，忽視「清健」這類傳統的審美特質，連帶排斥現實批判的主題。³⁴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所貶低的「小人之技」，正是符合黃周星品味的縱橫詩風。³⁵

至於詩人應如何表達含蓄婉曲之情，王夫之主張即景寓情、情景交融。曾守仁表示，由於王夫之以心性哲理的性情，改造文學上詩緣情的情性，故情景關係是基於「心—物論」的底蘊，不可名狀之情便能藉由「心物交感、即目所寓」的天人相應具體呈現，使「取景即是言情」，情語成為景語，如此一來，詩歌便能情景融洽，而不至於落入功能性的道德說教。³⁶換言之，王夫之所謂的情是倫理性的存在，而詩人應該透過自己的眼睛，在天地萬物間發現「道」，並以自然、不假思量的方式表現「道」的存在，是以王夫之反對彰顯個人的敘述、議論詩。³⁷既然寫景與抒情都應該在「即目所寓」、「感觸可及」的範圍內，抒情詩就得在一定的連續時空中才能成立，否則即為敘事詩，因此王夫之主張「五言詩的正體應循陶、謝之前一詩止於一時一事的範式，敘事則宜用七言歌行之體。」³⁸印證

³¹ [明]王夫之著：《明詩評選》，卷5，頁1440，徐渭〈嚴先生祠〉後評。

³² [明]王夫之著：〈召南〉，《詩廣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3冊，卷1，頁308。

³³ [明]王夫之著：《古詩評選》，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4冊，卷5，頁821，庾信〈詠懷〉後評。

³⁴ 蔣寅：〈王夫之詩論的批判性、獨創性與詩歌批評的缺陷〉，《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頁37。

³⁵ 孫車龍梳理「快」從先秦《詩經》至清代詩、詞、曲的語意演變和批評情形，指出「快」因帶有「放縱」之意，即便創作時恣肆奔放的心理狀態難能可貴，但也有「太快易剽」、失去中和之美的缺失。詩學意義上，則包含對語詞流利、節奏快暢、清逸俊爽風格的形容，抒情說意的直白表達，以及容易缺乏委曲沉著之致等，顯然「快」的意義與王夫之主張的平和、溫柔敦厚、含蓄婉曲截然不同。見氏著：〈論中國古典詩學批評中的「快」〉，《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50輯（2020年6月），頁208。

³⁶ 曾守仁：《王夫之詩學理論重構——思文／幽明／天人之際的儒門詩教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402-403。

³⁷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意見，使本文論述能更加豐富完整。

³⁸ 蔣寅：〈王夫之對詩歌本質特徵的獨特詮釋〉，《文學遺產》2011年第4期（2011年7月），頁112。

錢仲聯所言，王夫之的三部選本絀落許多長篇敘事名作，其中杜詩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唐詩評選》皆不予選錄，可見其對五言敘事長詩的鄙薄。³⁹

與之相反，黃周星極力讚賞杜甫長篇敘事詩和詩史：

長篇纏綿悱惻，潦倒淋漓，忽而兒女喁喁，而老夫灌灌，似騷似史，似記似碑，誠如涪翁所言，足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唐詩快》，卷 2，頁 4a，〈北征〉）

通篇具描畫豪貴穠艷之景，而諷刺自在言外，少陵豈非詩史？（《唐詩快》，卷 6，頁 12b，〈麗人行〉）

字字經史。（《唐詩快》，卷 9，頁 3a，〈有感五首〉其四「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夾批）

讚美〈北征〉的「長篇纏綿悱惻，潦倒淋漓」，且將有「似騷似史，似記似碑」的詩史特色作品，與《詩經》相媲美，甚至以「字字經史」稱譽杜甫反映時事的詩句，試圖抬高杜甫的詩史地位與價值。

郭瑞林批評王夫之對杜甫存有嚴重偏見，並歸納出王夫之貶杜原因有三，包含王夫之認為杜甫有悖風雅傳統，且論詩厚古薄今、重漢魏輕唐宋。⁴⁰換言之，王夫之認為杜甫的敘事長詩多議論直刺，少含蓄婉曲，有悖《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蔣寅進一步指出，王夫之認為杜甫反映社會現實的議論詩，對後人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⁴¹王夫之斥責杜甫以詩論史，打破文體疆界的作法，「梏桎人情，以揜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耶？」⁴²將杜甫的詩史地位貶低成「風雅罪魁」，其看法確實異於常人，也有失公允。

在王夫之的詩歌批評中，對明代詩壇的反省是重要一環。蔡英俊指出，王夫之的詩論以情為主，推尊詩人自然流露的真實情趣，故反對人為、刻板的詩法規範，更進一步貶斥標榜學習詩法的「門庭」。⁴³蔣寅認為，《唐詩評選》收錄最多杜甫詩，且評語也都以正面褒揚為多，正是反映出王夫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杜甫本人的成就，「只是極度反感明代的門戶之見，遂遷怒於老杜這明代詩壇最大的門戶，從不同層面對杜甫進行了嚴厲的批評。」⁴⁴陳美朱老師詳細梳理王夫之

³⁹ 錢仲聯：〈王船山詩論後案〉，《文藝理論研究》1980年第1期（1980年3月），頁90-91。

⁴⁰ 郭瑞林：〈千古少有的偏見——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詩〉，頁85-87。

⁴¹ 蔣寅：〈王夫之詩論的批判性、獨創性與詩歌批評的缺陷〉，頁37。

⁴² [明]王夫之著：《明詩評選》，卷5，頁1440，徐渭〈嚴先生祠〉後評。

⁴³ 蔡英俊：〈王夫之詩學體系析論〉，《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第四章，頁306-308。

⁴⁴ 蔣寅：〈王夫之詩論的批判性、獨創性與詩歌批評的缺陷〉，頁36-37。

對明人學杜的諸多批評，主要集中在以詩為史、以議論為詩，以及詩作近情入俗三方面，並為王夫之對杜甫有所批評，《唐詩評選》卻收錄杜詩最多數量的矛盾現象提出解答。王夫之正是不滿當時詩壇的學杜風氣，認為明人不知杜詩本色，故《唐詩評選》基於指導如何學杜的立場，選錄最多的杜詩。⁴⁵

至於《唐詩評選》所收杜詩，以平淨、自然的詩風為主，評語注重詩句的委婉曲折筆法，強調詩作情感的含蓄不俗，鄖國平、葉佳聲認為，這些現象與王夫之評杜「尊兩頭而貶中間」有關，《唐詩評選》「特別突出杜詩閒雅深婉而有神行之妙的一面，實際上是抑奇求平的詩歌藝術觀的反映，以此承續漢代文人古詩『平美』的藝術傳統，改變豪橫張放的詩壇風氣。」⁴⁶王夫之希望能藉由提倡平的審美，矯正詩壇對奇的過分追求，回歸含蓄、溫柔敦厚的傳統。

綜上所述，《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對杜詩選錄存在差異，主要原因是兩家的詩觀不同。黃周星以快為論詩核心，強調選詩符合驚天、泣鬼和移人主題，這些具有誇張、幻化色彩的詞彙，應該與其戲劇家的身份有關。此外，由於黃周星偏好表現出強烈情感、能引起讀者情緒劇烈波動之詩，故而更加欣賞風格豪放奇崛、情感深切沉痛的杜詩；王夫之論詩以平為貴，認為表達情感應含蓄蘊藉，品評詩作則多強調雅俗之別，並透過批評杜甫，貶斥明人的學杜風氣，以此建構其詩學理論體系，兩部選本因而呈現出相異的杜詩面貌。

（二）晚明開放學風

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晚明被視為學術風氣多元開放的時代，嵇文甫以「許多道光彩紛披的明霞」照耀晚明的比喻，說明其為動盪且斑駁陸離的過渡時代。⁴⁷關於晚明的時代特色，張兵指出晚明的社會環境相對寬鬆，文藝思潮多樣化，詩壇非常活躍，詩人有暢所欲言、書寫心志的自由，但同時內憂外患與朝政腐敗的現實，使士人心態變得十分矛盾而複雜。⁴⁸論及晚明思潮，學者多從陽明心學與泰州學派的影響說起，其積極意義，在於脫離程朱理學的傳統，強調主觀自我的重要性，興起個性解放的思潮，重視個人情感的抒發。⁴⁹由於陽明心學、泰州學派的思想深植人心，重視個體靈性、悟性與創造性的價值，故文人不將學術重心放在考據，而是強調自身的創新見解，思維方式傾向求異的「輻散型」，研究學問則喜好提出己見與新說。⁵⁰在文學方面，則有李贄（1527-1602）、公安三袁、

⁴⁵ 陳美朱：〈尊杜與貶杜——論陸時雍與王夫之的杜詩選評〉，頁93-97。

⁴⁶ 鄖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頁58。

⁴⁷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1。

⁴⁸ 張兵、楊東興：〈明清之際：詩人心態與詩歌走向〉，《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2022年5月），頁104。

⁴⁹ 李建國：〈「理」的毀棄與「情」的張揚——兼論晚明的尚情思潮〉，《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1994年9月），頁57-58。

⁵⁰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157

湯顯祖（1550-1616）、馮夢龍（1574-1646）等「尚情派」的代表人物，以鍾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以及陳子龍（1608-1647）、李雯（1609-1647）、宋徵輿（1617-1667）等雲間派詩人，這三個詩學主張不同的詩人群體，不僅反映出當時士人心態的三種樣貌，同時也體現晚明思潮的發展流變。⁵¹

黃周星和王夫之作為明遺民，自然也會受到晚明多元開放的學風影響，謝孝明提到：「鄧顯鶴目周星為『畸人』。梁啟超先生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稱與周星生活於同時代的明遺民多為畸儒、畸士、畸人，一個『畸』字，可謂傳其精神，或可視為明遺民集體性格的標誌。」⁵²鄧顯鶴在輯錄湖湘先賢生平與詩作的詩歌總集《沅湘耆舊集》中，以「黃畸人周星」作為其相關資料的條目名稱，⁵³而梁啟超（1873-1929）《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以「兩畸儒」指稱王夫之與朱之瑜（1600-1682）。⁵⁴羅欣提到晚明「畸人」文化盛行，「畸人」泛指不入流俗且有過人之處者，在才德、事蹟和成就上，為多數文士所推崇，故文人以「畸人」自稱或讚譽他人，黃周星即為明末清初的代表之一。羅欣進一步指出晚明「畸人」文化的意義：

明代的畸士之風展現出明代文士的尚畸好德的價值觀念和精神風貌，映現著明代文人日益覺醒的時代精神，表達了明代文人對文人主體精神的特殊追求，也是對那個時代思想、政治、文化的文學性表現。⁵⁵

「畸人」可說是晚明的時代特色，「畸」作為黃周星和王夫之共同的明遺民精神，不僅代表政治認同，也象徵晚明思想和文化的延續，透過《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對杜詩的特殊選評，體現選家奇特而不合時俗的主觀意見。正如孫琴安所言，黃周星的選評展現了個人的眼力，如云：

一聯自是畫景，卻從未有能畫得者，足見此詩之奇謠。（《唐詩快》，卷 11，頁 9a，〈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皆指菊花開」夾批）

真正冠冕文章。（《唐詩快》，卷 11，頁 9a，〈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夾批）

⁵¹ 張兵、楊東興：〈明清之際：詩人心態與詩歌走向〉，頁108。

⁵² [清]黃周星撰，謝孝明點校：《黃周星集》（長沙：岳麓書社，2013年），頁5。

⁵³ [清]鄧顯鶴：〈黃畸人周星〉，《沅湘耆舊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1冊，卷27，頁10b。

⁵⁴ 梁啟超：〈兩畸儒〉，《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第七章，頁109-122。

⁵⁵ 羅欣：〈晚明的畸人文化及成因〉，《瀋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4期（2021年10月），頁75-77。

以無人能畫出詩句之景，以及「冠冕文章」的美譽，推崇〈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之特異奇譎。又如五絕〈答鄭十七郎一絕〉以「恬雅」入選（《唐詩快》，卷14，頁10a），對〈哭李尚書之芳重題〉「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的愴然之情有所感觸。（《唐詩快》，卷9，頁10b）不但收錄了杜甫相對不著名的詩作，還給予許多正面評價。此外，黃周星對所選名篇也有個人的見解，如〈夢李白二首〉後評云：

此二詩乃夢李白也。是時白尚未死，然竟似弔李白矣。後來白果墮江波，果為蛟龍得，又安知非詩讖？（《唐詩快》，卷2，頁5b）

似乎相信李白因醉酒撈月而溺亡，並將此詩視為杜甫對李白的詩讖預言，評語已脫離了文學批評的性質，更接近宗教神祕學範疇。從這些特殊選目與評語來看，《唐詩快》確實可說是強調選家個人性情，選評異於世俗的選本。⁵⁶

至於《唐詩評選》的個性成分，在於對杜甫褒貶兼備的評價。宋人以杜甫作為詩家典範，其後元、明、清三代，除了王士禛（1634-1711）等少數文人外，幾乎所有詩人都和宋人一樣尊杜。⁵⁷蔣寅認為王夫之改寫了杜甫的詩壇地位，「由此降落到歷史的最低點」。⁵⁸鄖國平、葉佳聲也指出「王夫之評杜，揚抑尊貶，雜出互見，立論多與眾相異，因而也就較具有爭議性，在杜學史上，很有其特色。」⁵⁹觀《唐詩評選》中對杜甫的褒貶兩極評價，正面肯定的評論如：

雕琢入化，而一氣順妙。悲涼生動，無出其右。一似因前六句生後二句，則文生情；一似因結二句生前六句，則情生文。（卷3，頁1018，〈秦州雜詩二首〉其一後評）

如此作自是〈野望〉絕佳寫景詩，只詠得現量分明，則以之怡神，以之寄怨，無所不可。方是攝興觀群怨於一爐鍾，為風雅之合調。（卷3，頁1018-1019，〈野望〉後評）

讚揚〈秦州雜詩〉其一的寫作手法雕琢而能入化境，情與文的相生使文氣順妙，而詩作的情感描寫「無出其右」。又如對五律〈野望〉的評語，認為此為絕佳寫

⁵⁶ 孫車龍認為，黃周星以「快」作為選詩標準，「這在清代詩選家倡以『溫柔敦厚』、『範於和平』的政治標準氛圍中可謂獨樹一幟，為彼時詩壇吹入一股清風。」見氏著：〈論中國古典詩學批評中的「快」〉，頁213-218。

⁵⁷ 莫礪鋒：〈詩學絕詣與人品高標的千古楷模〉，《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六章，頁398。

⁵⁸ 蔣寅：〈王夫之的詩歌評選與唐詩觀〉，頁12。

⁵⁹ 鄖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頁55。

景詩，是詩人不假思量、真實自然的所見所聞，能充分發揮詩歌興、觀、群、怨的功能，並將此詩推崇為「風雅合調」。然而，王夫之卻也批評杜甫曰：

杜陵敗筆有「李瑱（鼎）死歧陽」，「來瑱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種詩，為宋人謾罵之祖，定是風雅一厄。道廣難周，無寧自愛。
（《唐詩評選》，卷 2，頁 958，〈後出塞二首（獻凱）〉後評）

認為杜甫直白、寫實的詩句，開啟了宋人作詩謾罵的不良風氣，斥責其為「風雅一厄」，還批評杜甫過分「情事樸率」的詩為「自墮塵土」，又指出杜甫有「取驚俗目」的「門面攤子句」，並將這些詩句貶斥為「裝名理為腔殼」、「擺忠孝為局面」，甚至認為是「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闕處」（《唐詩評選》，卷 3，頁 1021，〈漫成〉後評），由批評詩句延伸攻擊杜甫品行低劣，王夫之對杜甫的嚴苛批評十分少見，其個人好惡也非常鮮明。

與晚明多元開放、崇尚「畸人」精神的風氣相比，由於盛清出現如康熙（1661-1722 在位）御定的《御選唐詩》，以及乾隆（1735-1796 在位）御選《唐宋詩醇》這類由官方主導編選的詩歌選本，故清代文人在編撰選本時，更容易受到官方正統的詩觀影響。以影響力較大的《唐宋詩醇》為例，莫礪鋒指出，由於該選本屬於「御選」性質，評注中強烈推崇杜甫的忠君愛國，並延伸到其他各家的評注。除了提倡忠愛，各家評注也強調詩作的政治教化意義，其中以白居易集為最多，是以「貫穿於全書的此類評語當然不可避免地散發出相當濃厚的封建說教氣味。」⁶⁰廖美玉老師指出，乾隆特別留意杜甫篤於君上忠愛之忱，不僅在《唐宋詩醇》卷首〈隴西李白詩·小序〉稱許李、杜同樣忠君愛國，又在〈襄陽杜甫·小序〉中，讚揚杜甫「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同時也落實在具體詩作的評論，再三強調杜甫忠愛的情操。⁶¹可見清代的官方選本，特別重視杜甫的忠愛至情，其原因則與政治時風密切相關。

《唐宋詩醇》之所以在清代影響深遠，主因是乾隆 22 年（1757）科舉加考試律詩，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上諭：「嗣後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會試為始。」⁶²蔣寅提到科舉試詩的影響，包含調和唐宋詩之爭、大量唐人試律選本與詩法啟蒙教材付梓、文人將應試之作收入詩集，甚至加以箋注並刊為專集，也促使試律詩的相關研究。⁶³謝海林則總結

⁶⁰ 莫礪鋒：〈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2第3期（2002年6月），頁133、135。

⁶¹ 廖美玉：〈帝王青睞——清高宗《唐宋詩醇》評選杜詩評議〉，《論爭與推激——學杜的多元面向》（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0年），第七章，頁316-318、357-360。

⁶² [清]巴泰、圖海等奉敕修纂：〈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下〉，《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年），卷531，頁694-695。

⁶³ 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2014年10月），頁

乾隆欽命詞臣編纂選集的目的，是為了彰揚風雅，裨補世道，以及提倡溫柔敦厚的詩教，藉由官修選本掌控選家編纂詩選和批評的權力，影響士大夫和民間文人的思想與審美。⁶⁴例如沈德潛（1673-1769）《唐詩別裁集》正是受到官方力量左右的選本，根據范建明的研究，由於沈德潛先前編選《清詩別裁集》時，將錢謙益（1582-1664）列為國朝詩人之首，因而觸怒乾隆皇帝，為了挽回過失，「沈德潛想到了欽定的《唐宋詩醇》。……於是，不管高齡已逾九十，沈德潛決定對『初刻本』進行全面修訂。」《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之所以較初刻本多選 56 首白居易詩，乃沈德潛為了表明他與乾隆御選《唐宋詩醇》的詩觀一致，⁶⁵而做出的妥協。

透過晚明和盛清兩個時代的選本對比，更能凸顯出晚明詩壇較為多元開放的風氣。《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在選評杜詩方面雖有許多相異之處，但也恰好體現晚明思潮對個人主觀意見的重視。

五、結論

《唐詩快》與《唐詩評選》皆為明清之際的唐詩選本，也都被學者視為選評異於世俗審美。本文以兩書選錄數量最多的詩家杜甫，作為討論對象，分別梳理《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對杜詩的選錄，並比較黃周星和王夫之評論要點的同異，藉此探究兩家選評杜甫詩的差異原因，期望透過兩部選評標準與眾不同的唐詩選本，了解明遺民如何看待杜甫。

透過梳理選詩的情形，發現《唐詩快》和《唐詩評選》共同選錄杜詩的數量、比例都不高，就兩書皆選錄的杜甫詩題而言，黃周星和王夫之有持論相似處，集中在肯定杜詩的筆法及詩歌成就。兩書各自獨選的杜詩數量較多，形塑的杜甫形象也有所差異，黃周星重視個人主觀的閱讀感受，旨在領會杜甫詩中的情感，評語多讚嘆杜詩雄偉奔放的風格，以及奇特高妙的筆法；王夫之則點出杜詩的平美風格與委婉含蓄的筆法，在情感方面，則稱許杜甫情景交融、情感含蓄之作。

《唐詩快》與《唐詩評選》之所以選錄杜詩的不同風貌，主因是兩家的詩觀存在根本差異。黃周星將詩作主題分為驚天、泣鬼和移人，並以快為核心，貫串《唐詩快》的選評標準，因此對豪放奇特、真情動人的杜詩情有獨鍾；王夫之的審美抑奇求平，故重視詩歌情感的委婉含蓄，所選杜詩皆符合此類標準。另外，王夫之也批評杜甫以詩為史與重議論的敘事長詩，藉此貶斥明人學杜的末流歪風，而黃周星對杜甫詩史則是抱持讚譽的態度，可見兩部選本對杜詩的偏重不同。

143-163+208-209。

⁶⁴ 謝海林：〈王朝文治與清代御定宋詩選——以康熙《御選宋詩》、乾隆《御選唐宋詩醇》的編撰為中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5年第3期（2015年5月），頁86-87。

⁶⁵ 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25期（2012年12月），頁70-71。

《唐詩快》和《唐詩評選》對杜詩的選評差異甚鉅，選本如實反映選家的個人特色，兩書可說是晚明多元開放學風與尚「畸」風氣下的產物；清代則因官修選本提倡忠愛、詩教，士大夫與民間文人深受影響，出現像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選詩迎合官方正統詩觀的現象。對比之下，更能凸顯《唐詩快》和《唐詩評選》的時代意義。

黃周星和王夫之都透過詩歌選本的選評實踐，具體呈現出兩家的相異詩觀，本文的研究文本《唐詩快》與《唐詩評選》，兩位選家的生平有許多相似處，也都有「畸」的明遺民精神，但造成兩人詩觀截然不同的原因為何？又王夫之藉由選評杜詩，對明代詩壇風氣進行反思，而黃周星對明代詩壇有何看法？這些皆為值得探究的議題，期待未來能在本文研究的基礎上，對相關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徵引書目

(一) 專著

- [周]左丘明撰，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
-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 [宋]朱熹集注，蔣立甫校點：《楚辭集注》，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王夫之撰：《薑齋詩話》，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明]王夫之著：《古詩評選》，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4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
- [明]王夫之著：《明詩評選》，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4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
- [明]王夫之著：《唐詩評選》，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4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
- [明]王夫之著：《詩廣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3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
- [清]巴泰、圖海等奉敕修纂：《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年。
- [清]朱彝尊著，[清]姚祖恩編，黃君坦點校：《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 [清]陳鼎：《留溪外傳》，收入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第128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清]黃周星：《唐詩快》，清康熙32年（1693）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 [清]黃周星撰，謝孝明點校：《黃周星集》，長沙：岳麓書社，2013年。
- [清]葉夢珠：《閱世編》，收入闕名輯：《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8年。
- [清]劉聲木：《萐楚齋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
- 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陳伯海等著：《唐詩學史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
- 曾守仁：《王夫之詩學理論重構——思文／幽明／天人之際的儒門詩教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年。
- 賀嚴：《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廖美玉：《論爭與推激——學杜的多元面向》，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0 年。
-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
- 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 第三卷：聖道與詩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年。

（二）期刊論文

- 李建國：〈「理」的毀棄與「情」的張揚——兼論晚明的尚情思潮〉，《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1994 年第 2 期，1994 年 9 月，頁 54-59。
- 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25 期，2012 年 12 月，頁 57-74。
- 孫車龍：〈論中國古典詩學批評中的「快」〉，《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50 輯，2020 年 6 月，頁 203-221。
- 徐國能：〈以「俗」論杜辨析〉，《淡江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9 年 6 月，頁 1-32。
- 涂波：〈說「平」——王夫之詩學批評中的重要概念〉，《船山學刊》2006 年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1-14。
- 張兵、楊東興：〈明清之際：詩人心態與詩歌走向〉，《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第 4 期，2022 年 5 月，頁 103-110。
- 莫礪鋒：〈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2 第 3 期，2002 年 6 月，頁 132-141。
- 郭瑞林：〈千古少有的偏見——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詩〉，《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4 期，2000 年 7 月，頁 82-87。
- 郭蘇夏：〈黃周星《唐詩快》的綜合向度與悲劇意味〉，《中國詩歌研究》2024 年第 1 期，2024 年 7 月，頁 224-235。
- 陳美朱：〈尊杜與貶杜——論陸時雍與王夫之的杜詩選評〉，《成大中文學報》第 37 期，2012 年 6 月，頁 81-105。

- 鄖國平、葉佳聲：〈王夫之評杜甫論〉，《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1期，2001年3月，頁55-61。
- 蔡鎮楚：〈船山詩話與中國傳統文化〉，《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1988年4月，頁29-36。
- 蔣寅：〈王夫之詩論的批判性、獨創性與詩歌批評的缺陷〉，《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頁28-40。
- 蔣寅：〈王夫之的詩歌評選與唐詩觀〉，《文學與文化》2011年第2期，2011年5月，頁4-12。
- 蔣寅：〈王夫之對詩歌本質特徵的獨特詮釋〉，《文學遺產》2011第4期，2011年7月，頁105-115。
- 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2014年10月，頁143-163+208-209。
- 錢仲聯：〈王船山詩論後案〉，《文藝理論研究》1980年第1期，1980年3月，頁88-92。
- 謝海林：〈王朝文治與清代御定宋詩選——以康熙《御選宋詩》、乾隆《御選唐宋詩醇》的編撰為中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5年第3期，2015年5月，頁81-87。
- 羅欣：〈晚明的畸人文化及成因〉，《瀋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4期，2021年10月，頁74-78。

附錄一：《唐詩快》與《唐詩評選》皆選錄的杜甫詩作

詩體	《唐詩快》和《唐詩評選》皆選錄的杜詩	數量
五古	〈新婚別〉、〈後出塞（朝進）〉、〈贈衛八處士〉	3
七古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麗人行〉、〈哀王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10
五律	〈晚出左掖〉、〈落日〉、〈祠南夕望〉、〈夜宴左氏莊〉	4
七律	〈紫宸殿退朝口號〉、〈秋興（夔府）〉、〈詠懷古跡（羣山）〉、〈題張氏隱居〉	4